

從外交談判到

民族戰爭

鄭學稼著



抗戰出版社印行

版權所有

從外交談判到民族戰爭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編著者 鄭 學 稼

印行者 抗戰出版社

漢口府前一路三九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

寫在卷前

我們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之最後勝利，是在於「時間」，不在於「空間」。爲着這個原因，當戰爭爆發之前，我們需要「準備」。「準備」之時間愈長，取得最後勝利之保障也愈大。這是從歷史的及社會的觀點出發，必然的結論。

在「準備」過程中，我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自然而然地，在外交方面，表現容忍的態度。這個容忍的外交，自岡田內閣起，至抗戰前夜止，有冗長的經過，和複雜的內容。中間不僅關涉到中日兩國，而且牽連英國。無需說，中日的問題，本質上就是世界問題的一章——而且是佔極重要篇幅的一章。

我們「準備」的目的，是增強抗戰的力量，不是爲着「準備」而再喪失國土及主權。所以，中央政府過去的外交，雖然是容忍，却有一定的限度。可讓則讓，應爭則爭。所讓的，是無關民族的生存，所爭的，是民族獨立不可缺少的前提。由之，當達到不能再退讓時，便領導國民，動員國民，作英勇的抗戰。

抗戰之幕一開，我們的目的，就在於取得最後的勝利。在「時間」上之暫時的得失，不足關涉大局。政府和國民，也不因而動搖抗戰的信念。

這是抗戰前後的已成事實。

本書證明政府的抗戰，不是受某種的感覺而發生，乃屬她的本來任務。中央政府自「九、一八」起，從未放棄過民族鬥爭的責任，而且還於容忍外交的敷衍中，不懈地爲履行其責任而努力。

所有的材料，係選自我過去以家禾筆名發表的論文，計有（一）發表于文化建設月刊第三卷第三號的「一年來的中日關係」；（二）發表于申報週刊之關於「日本南進北守」及「日英在華經濟勢力之消長」——以上構成本書第一節。（三）發表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時事新報之「民族生死關頭的信號——中日經濟合作」。最後之「由談判中斷到民族戰爭」，係新的寫作。

學稼記於武昌珞珈山

一九三五至三六的中日外交

- 一・取滿洲救日本
- 二・三分中國
- 三・由有吉到有田
- 四・由有田到川越
- 五・五月間的華北
- 六・日本之南進與北進
- 七・北守南進與中國
- 八・日本南進與英國
- 九・日英與中國
- 十・中國換一副面孔
- 十一・由「成都」經「北海」「漢口」至「上海」
- 十二・緊張與鬆弛的循環

一 取滿洲救日本

日本資本主義爲挽救自己的危機，方發動軍事力量攫取中國的滿洲。從滿洲她究竟得到若干的利益呢？概括地說來：（一）因爲佔領滿洲，是打破數十年來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均勢局面；所以日本爲保障佔領和準備由佔領而引起的戰爭計，不能不改裝自己的工業。由明治維新到『昭和聖代』六十餘年間，高飛猛進日本輕工業的地位，逐漸爲重工業所代替。（二）重工業的發達，彌補受中國排貨運動受各國關稅壁壘阻擋之輕工業的停滯，使城市失業問題的急喘，暫時間得到蘇息的機會。（三）軍需景氣，浸透小資產階級，使他們排脫若槻內閣緊縮政策的痛苦；並且賴有滿洲的尾閘，縱使不一定禮讚『高橋財政』，而當時給與的實惠，確足減少他們對政府的不滿，由之造成法西斯運動浪潮的低落。（四）受滿洲資本主義發展而陷於窮境的大倉財閥，以及與滿洲有資本血統關聯的有產者，隨『皇軍』之後，作稱心如意的掠奪，同時，建設滿洲的『資本飢餓』，也調劑了日本國內資本過剩的痛苦。（五）不滿字垣派隱健行爲的少壯軍人，有一塊用武之地，有一個使他們不流血而可耀武揚威的對象，自然而然地，在當時把一分對內的精神，移到『王道樂土』粉飾的上面。（六）中國由於『統一』尚未完成之故，不得不忍受對方軍事的壓迫，結果除一轉瞬間任太陽旗飄揚於山海關與承德城樓之上外，還一掃前此被他們所恥笑的『五分鐘』熱忱，連素來的拿手好戲——『抵制劣貨』也不敢排演，這放鬆了大阪的輕工業。於是中日關係史中，放出日本人看來是光彩，在中國人看來是可恥的一頁，牠就是軍事的侵略，不獨沒有幣原喜重郎的杞憂，會引起輕工業的停滯，而且『不打不相識』似地，日本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反用對中國出乎情理之外的強硬，得到圓滑的解決。

由之，我們明白，九一八事變，無異是垂死日本資本主義的強心劑。經過這一度的注射，除農村破

產無法改善外，城市可聽到『景氣』的呼聲。

滿洲爲日本盡了上述功能之後，自身却成爲日本資本主義鐵輪的犧牲品。雖然數年間，她吸收了十餘萬萬的日圓。而這些金額對她自己並無補益。資本灌入日本所缺天然富源的部門，開出來的是軍火業和道路的花朵，她不特無益於滿洲的經濟，而且蜿蜒於滿洲邊境的軍事工程，和『皇軍』的『宣揚國威』，反驚憤了她的生產者——農民，反激起農民的勇敢抵抗。如是九一八後的滿洲，是用農村的火炬，來映襯城市的電光，是用義勇軍的槍聲，來和諧關東軍要人宴會時的『三味綫』。

到一九三四至三五年間，上述現象，更加顯明。最足威脅關東軍參謀處的，就是農產物價格的低落：估滿洲輸出貿易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大豆，每年平均出產五百萬噸，全世界的產額不過八百萬噸。牠的市場，在九一八前除歐洲外，就是中國本部和日本。中國當日銷路的銳減，是勢所必然。日本由於成爲人造肥料業的競爭品，受化學工業大王的反對，無法作大量的吞納。在歐洲唯一的顧客——德國，雖然關東軍廉價地以之交換軍火，而由於輸入限制的緣故，也不能符合軍部理論家的算盤。因此在一九三四年滿洲對外貿易表中，大豆品（內包括大豆、豆餅、豆油等）比前年輸出量增加，而金額不過二億二千八百一十一萬八千餘元，却比前年減少一千九百六萬三千元。其他如雜糧，如特產野蠶絲，也具着同一的現象。農產品跌落，縱不使農民破產，已足引起農村購買力的疲憊，這反映在滿洲的對外交易表中，就是佔輸入總額（大部分是生產部門的用品）百分之十六的棉織物，與前年度相比，計棉布減少百分之七，棉織絲減少百分之三四。食品中如砂糖減少百分之二九，小麥粉減少百分之二・七，再由輸入小麥粉金額減少而數量增加的事實，給我們暗示了北滿土著製粉工業，已粉碎於日本製粉業傾銷的武器之下。經濟上農民對於必需品購買力的衰落，政治上必然成爲義勇軍活動的良好環境。於是，城市與農村『剪刀』的危機，不獨粉碎具着麻醉性的『王道』教育，且變爲民族意識的天然培養劑。再加上大規

模『武裝移民』之圈佔土地的行爲，迫輾轉於鐵蹄之下的農民，只有用武力去報答爲他們建立破產的『王道樂土』的辛勞。關東軍能夠發揮『帝國最新科學結晶』——武器的威力，『掃蕩』（？）滿洲的遊擊戰爭，不能夠消弭由農村破產而造成之農民對他們的抗鬥行動。

到一九三五年末，聰明的關東軍幹部，已感到要醫治滿洲的沈疴，不能專由滿洲本身着想，應向滿洲的母國——中國去找覓對症的藥劑。回憶九一八前後中國軍政禮讓的情況，他們對華北冒險的野心，又油然而生。這個野心的代價，便是迫東北軍移駐香河的自治運動（十月），冀察委員會的設立（十一月），和漢奸殷汝耕的偽冀東自治政府的組織。這些像連珠砲似的一幕一幕排演出來，唯一的目的，是要使華北五省變爲滿洲第二。

過去，他們奪取我們的滿洲去救活日本；現在他們又舊調重彈，要把我們的華北五省，作爲蘇醒滿洲的犧牲品！

二 三分中國

所謂華北五省，是指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山東而言。總面積計三十九萬三千平方哩（約等於日本一倍半），人口八千萬，僅僅這些數字，已足給我們說明：如果日本佔有了地，於解除滿洲危機之外，尚大有補於整個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

在軍部理論家的眼中，究如何處理這地大物博的五省呢？可由他們的理論，得到答覆。我們如非健忘，應記得他們時常所提唱的『滿華布洛克（或集團）經濟』。他們用『共存共榮』的『伊甸』，來引誘我們，『工日本農中國』的美名，來遮掩他們自己的鬼面孔，事實上這個布洛克形成之日，就是中華民族萬劫不復之時。因爲，按照他們的計劃（一）於華北地土氣候適合的省分，種植大阪棉花工業所需要

纖維長度的棉花，這具有兩個功用：第一，若使棉花種植成功，則種棉的農民，由於依靠日本棉花業的緣故，消失，至少也減低後日反抗的可能性；其次，如河北，如山東是出產大小麥高粱等作物的區域，如改種棉花，則在布洛克前提之下，滿洲同樣的農產品以之為市場，可挽回今日價格跌落的景象。（二）日本本身是缺乏促進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必需的富源，如煉鋼的焦炭和鐵，雖然取得了滿洲，還不能填補這個缺憾，一旦能夠開發華北，就把埋存千三百億噸的山西焦炭，暫置不述，而河北的開灤、井陘、門頭溝和柳江，山東的淄川、濰縣和中興，所有的產額，至少夠供十年內日本工業的消耗，此外他們尚計劃以上述的焦炭煉龍烟的鐵。（三）就戰略上述，為加強華北的統治計，需要由津浦路滄州至平漢路石家莊的滄石鐵路；由包頭至甘肅蘭州的包蘭鐵路；由張家口經熱河至秦皇島的鐵路，這三條鐵路一成，除緊握平漢津浦交通的動脈外，另把華北五省與滿洲熱河一氣貫通，再加渤海灣的築港，使水陸互相呼應，那時候就不說還我河山無日，恐怕我們自己連嘆一口氣的力量也沒有了！（四）除上述之外，另有獨佔華北市場的作用。

為要實現上述的抱負，三宅坂和奉天的參謀機關，便按照中國當日的情况，產生了『三分中國』的策略。一方面以華北駐屯軍為主體，企圖使華北五省成立聯省自治，與中央政府分離；另一方面又企圖扶植兩廣，期以廣東為中心，產生與南京分家的華南政府。這時候有十肥原賢二，奔走滬港粵桂及閩，多方遊說；同時以石原財閥為背景的『大亞細亞主義』提倡者，松井石根大將，也巡遊滿洲華北和港粵。他們都公開地說中國沒有『統一』的可能，誰愈想『統一』，誰便愈把中國弄成四分五裂，唯一的辦法，就是他（松井）特地為大阪每日所撰中日國交正常化之途一文內所指示之『向統一的過渡，是聯省自治』。在這論文公刊之前，另有非常鄙視中國却受中國文明蒙養，寫起日本文章來帶着『之乎者也』，同時又以善做漢詩驕傲同種文士的『文章報國』貴族院議員，六十餘卷國民日本史作者德富蘇峯，他在

同報上以中國之自治運動（一九三五，十一，二四）爲題，胡說中國『自治』是出於『歷史的傳統』。如以『中國爲中央集權的一國，其版圖未免過廣。有史以來，中國之統一，在事實上，殆不多見，偶而有之，亦不過有名無實而已。』更荒謬的是越俎代庖地爲我們開個方劑，說：『中國人之治夷狄也，云以不治之治治之。然此非僅治夷狄已也，即治自國，亦本此法。以不治治之者，即放任自治』。於是勸中國政治家應允許華北以及其他各省自治。

自治的策謀雖好（？），究如何實現？這隨着日本內部的矛盾，反映出策略實踐途向的分歧。依軍部的意見，迅速擴大華北駐屯軍的組織（這是一月七日陸軍省軍事課武藤中佐視察華北回國後的主張，前一日駐屯軍參謀池田純久中佐，已向川島陸相作同一的請求），以之壓迫宋哲元，走向自治化，與殷汝耕的偽組織同流合污，然後再同化山東山西。但是，岡田的內閣却主張緩進，謀合理的解決。這個主張，自然不是爲中國着想，乃是以元老重臣爲中心的穩重國策。在這些老政治家的經驗中，爲不戰而佔有市場而取得利益爲上策，只在不得已時候方請戰神出台。由之，在一九三六年初，日本對中國的方針，毫無遺憾地發揮了三宅坂與霞關兩重外交的面目。鑒於銀國有等等的設施，躁急地欲發動『皇軍』的威力，這可用當日武官領袖磯谷少將的言論爲代表；而元老重臣却雍容靜逸地，假廣田外相之手，主張即開南京會議，解決中日歷來的糾紛。這個事實，與日本國內固有政治的危機，造成明治維新以來所未有的二·二六政變；同時以三大原則爲開場白，展開此後中日外交的談判。

三 由有吉到有田

廣田宏毅任岡田內閣外相時，曾對議會宣稱：『當某任職之日，決不會對外戰爭』，以慰有產者的代表。他從『自主的協和外交』出發，一面和海軍一致壓迫陸軍放棄立即對蘇戰爭的立場，一面自負調

整中日國交的任務，向中國政府提出三大原則：（一）取締反日，（二）承認偽國，和（三）共同防共。如何地勸誘中國當局，接受這些原則，他準備召集南京會議，並電召駐比大使有田八郎替代受軍部反對和困難的有吉明駐華大使。

這時候中國政府已經改組，新的陣容對於廣田外相的抱負，究相差幾何，不能不加以一番的估計。爲着這個原因，在中日外交舞臺中，躍出一位新人，他便是我們常常在報紙上見到的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

須磨是一九三五年底搭長崎丸返國的，他在由長崎赴東京的火車中，以外交官的資格，放言：『總而言之，對華問題，似不能在短時間內解決，當江戶城移交時；勝海舟與西鄉隆盛（註一）談判所用的坦白胸懷和精神，如果南京政府要人沒有的話，中日關係不會好轉的』（一月一日中外商業）。公開地把中國擬爲德川幕府，把日本作爲乘討伐之威，兵臨江戶（即今東京）城下的明治政府。同時還要叫中日的外交家，學習賣主求榮的勝安房守，而他們自身，則自命爲大西鄉，在接受投降前提下，僅慷慨地延長對方內部商議的時間和折衝其他寬大的條約而已。如果中國當局沒有這樣的存心，那麼中日關係不能『好轉』，暗示着那時震關外交家的責任完了，三宅坂繼之登台。

一月一日日本外務省總部會議，決定三點：（一）徵之中國方面取締抗日後的情況，稍見誠意，爲國民政府圖其徹底化計，希望開南京會議。（二）日本方面基於舊臘重光次官與丁代理大使的會談，要請國民政府將關於南京會議具體的討論內容，先提交日本。（三）帝國政府，要求盡可能地迅速使已提出之三大原則具體化（一月十日中外商業）。又依同報的記載，會議人物除兩國外交當局外，日本尚有海陸軍各當局及民間實業家的參加。會期係在有田新大使到任後，約爲三月中旬。

然而，這是日本內部以震關爲主體的對華策略。三宅坂雖不反對廣田的努力，自己仍單獨推行那

『三分中國』的既定方針，因為在軍部眼中，南京政府是『假裝親善』決無承認日本要求的存心，外務省醉心於『三大原則』的具體化，徒給與南京政府以敷衍的機會而已。自然處當日日本情勢之下，軍部這個急進的主張，很難得到勝利，川島陸相也寫着全盤計議，特地電召磯谷少將返國。

磯谷武官一月末返抵東京，三日向參謀部進言：（一）三大原則過於抽象，（二）徹底清算國民黨之排日抗滿主義，（三）容中國自動承認偽國（同日讀賣新聞）。五日他又用同一的內容，報告川島陸相（同日同報）。結果，軍部採取一方面交涉，一方面自治的方針，華北駐屯軍的擴大，也因而決定。

廣田提出三大原則的用意，除欲和平地解決中日兩國糾紛外，另含有統一外交的存心。由於上述，廣田這個存心，是毫無效果。所以當二月中旬有吉明大使返抵東京驛時似吐洩滿腹牢騷地，提出『一元化』的口號。由後日該大使在東朝上的自述（註二），給我們知道了這種呼喊，是經驗者之談。

有吉大使的『一元化』內容，是什麼呢？依十五日大阪每日的報告：（一）此後日本外交，應統一外務與陸軍兩省的主張，不宜有武官與大使的時常對立，使對方有無從接洽之感。（二）當新大使未到任前，先把日本的要求，全部羅列，提交未來的南京會議，使牠一一實行，武官與大使則本此要求，一促其實現。（三）在折衝過程中，應緩和『歷來之威壓和親善的兩重政策』，務使不惹起如往年之對華二十一條要求問題』的糾紛。（四）調和英美及蘇聯各國在華對日的感情，以『慎重方法』不『刺激』他們。（五）以華北問題為核心，使中國承認日本的本意；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他曾舉『六大原則』，但未洩露。（六）關於經濟及文化的提攜，本『互惠原則』而實現之。

上列建議，全部為外務省當局所接受，並根據牠製成方案，交新大使有田攜往南京。依後日的事實，似乎軍部所取得主張上的勝利，只有促進華北自治實現的一點。

有田大使三月四日乘安宅艦抵滬，六日呈遞國書後，即着手向國民政府交涉，此時適在二·二六政變之後，岡田內閣覆亡，兩國外交停頓。

四 由有田到川越

廣田內閣的外交政策，在組閣之後，可以說和他任外相時所手訂的，無大分別。那就是，對英重溫日英同盟的好夢，對蘇聯暫維持和平，對中國則希望實現自己手創的『三大原則』，又爲着駕輕就熟的緣故，升有田駐華大使爲外務大臣。因此，四月二十二日報知新聞的社論說：

『有田氏以華駐大使的資格往南京赴任，即與蔣介石張羣等中國主腦部毫無忌憚地交換關於今後中日國交的意見，互相披瀝彼此的胸襟，深信多少總有可造成調整中日國交的基礎工作。而且就任之時日雖短，在外交上毫無何種失策之處，獲得美滿結果而返日。在糾正中日外交上，可認爲是很好的條件。然而有田外相今後將以何種外交來打開目前的國際危局呢？談到此點，結果豈非與內閣的外交以大同小異的輪廓而宣告終結嗎？過去有田氏的外交經歷原來不是單純的協調主義！同時亦不偏於強硬外交之一途，站在所謂穩健主義的立腳點上，有以對外折衝毫無缺點爲外交重心的傾向。』

『在有田外相的次官時代，與政府中一部份強硬論者（按即對滿洲問題）意見不合，欲毅然辭職，表示退出外交界，由此可見其一般了。結果有田外相所懷抱對外政策的根本觀念，完全合於廣田首相所懷抱的外交方針，這是不難想像的，因爲是那樣，所以體察前內閣的對華方針，答應駐華大使的任命。當時的廣田外相即是新內閣的首相，既已在新內閣任新首相，新外相的外交方針如何，自然是既定的事實』。

有田外交的本質，如上面的論述，而報知新聞記者所『深信多少總有可造成調整中日國交的基礎工

作』究竟是什麼？在兩國外交文件尚未公佈之前，我們無法作準確的論斷，但讀賣新聞上海特派員（曾隨有田赴南京）田中幸利氏的通訊，頗足供我們的參考。他曾用有田大使中國歷訪之收穫的題目，告訴我們：『有田在南京任內，僅一十六日，但其間雙方之積極折衝的結果，與我方對華政策之變革以重大的指針，稱爲含有決定日華關係將來動向的重要性，諒非過言』（三月三十一日）。接着他自問在這十六日間中國方面給與『有田教育』，究竟是什麼呢？而有田自己所『學得』的又是什麼呢？田中氏帶幽默的口吻指出：『由有田張羣的共同宣言「雙方毫無忌憚交換意見，但對於重要之點，見解尚未一致」，這便是「有田全收穫的表現。」』因爲所謂重要之點，依田中氏的報告，即廣田的三大原則。中國不是毅然地拒絕有田的要求，而是婉轉的說明。三大原則中，由當時有田大使對日本新聞記者的自述，『……特別是華北問題，非常困難』。再依有田歸國（四月二日）時，對日本新聞紙談話中，公開地所指出軍部與外務二元化的外交的弊病，應先『確立對華外交打開的方針』（三日東朝）看來，不特日本自己最熱心提出的南京會議，葬於無形之中，而且受過中國『教育』的有田，連自己都感到應有再確立打開對華外交方針的必要了。既然『作爲帝國不動方策』，還須放在顯微鏡下去探索，那麼，人們推測當時有田腦中，認爲三原則不適交涉之用，並非無理。也爲着這個原因，又勞日大外務省，於四月六日發表否認『放棄三原則』的聲明。

可是在外務省聲明之後四日，大阪每日，却用很大篇幅披露一段與『聲明』相反的消息，且堪足證實有田的對華方針，不再採用三大原則的空洞名詞，而傾向取得實惠。大每所揭出『有田外相之新對華策』，計有五點：（一）對華外交分開華北的特殊政權與南京的國民政府；（二）強化冀察委員會，使日滿華之軍事政治文化及經濟，皆與以道義的與現實的援助；（三）與國民政府談判，以通商經濟爲第一，軍事政治次之，『當面緊要的，是撤回高率關稅，按相互主義，締結共同關稅協定，』結『日華經

濟同盟」；（四）不強迫中國承認偽國，但偽國可加入上述關稅協定，『企圖事實上形成日滿華布洛克』；（五）防止外蒙新疆赤化的侵入，中國應施有效的工作。

如果上述的新對策，可算是日本帝國政府的『對華不動方針』那麼，誰去促進這些方針逐一實現呢？在廣田的眼中是重光，然而叫這位好似金銀島的『拐約翰』，辦理對華的外交，在軍部看來，是不行的。自然所謂『不行者』，並不是說重光次官，缺乏外交的才幹，恰適相反，軍部所怕的，是有才幹的駐華大使，希望有田派一個可受他們驅使的人。結果曾以駐滿參事官資格，受過關東軍冷眼的『教育』，而貶赴廣州，後來似有所悔悟，轉任天津爲梅津將軍們奔走不遺餘力的川越茂，『異常拔擢』不經過公使而榮任駐華大使！

五 五月間的華北

川越駐華內定後，東朝天津的特派員，曾叩問他此後的『抱負』，有一段相當重要的談話，發表在四月十八日該報的上面：『誰就了大使任職後，欲早急地一掃日華間諸懸案，與兩國民所期待的完全一致，此事至難，外交非僅由人物支配，乃決定於大勢的動向。』所謂『大勢動向』是什麼？他沒有指出，只主張經濟外交是先急之務。咀嚼這位新大使的『抱負』，我們知道川越登台，對於日本外交的方針，並沒有重大的更易。雖然軍部以爲川越易於駕馭，但川越的『抱負』，與有田外交的本質，頗難分別。這樣軍部的立場，是否被霞關抹殺？自然不會的，因爲繼磯谷之後的喜多武官，他已在準備召集全華的武官會議。

如果上面的推測，大致不誤，則在四月末五月初間，日本的兩重外交，並未統一，——事實上，基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一元化』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中國的態度，十分軟衰，能夠予取予求，

——這似乎與有田外相的本衷相背，那又不是。因為，在霞關與三宅坂分頭進行中，日本中央部是用三相（外務與海陸）會議，來調和彼此的意見。從事實的表現看來，大概華北方面以軍部為主體，華北以外，由外交官負責。因此，自十一師團長田代皖一郎與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互調後，日本在華北的行爲，可以說只有軍部人員的活動，不見外交官的面影了。

何以有如此的現象呢？好似是當日中國的情況，尤其是華北的情況，已經更易，使日本暫時可以忍耐上述的對策。所謂當日華北局勢的變化，依川越自述（五月七日氏返國至門司時，答大每記者的詢問）是如此：『由去年五月至今日，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期，華北事件發生時，排除藍衣社之政治恐怖的政治橫行（？）。第二期，由去年十一月起，在華北有日華經濟提攜，冀東冀察兩政權的產生，使華北政治勢力統一。第三期，由今春起，入於兩政權與經濟開發的時代』（五月八日大每）。五月十七日有田外相在貴族院的演詞，也自稱『昨年春以來，南京政府的態度誠佳，日華間懸案，以及其他，可逐漸解決』。所缺憾的，只在於『中國對國交根本調整的決心不足』，也就是說：『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呼吸尚不能吻合』。『現政府所考慮的，係使該呼吸相合而已』。也就是『一方面促中國政府的決心，他方面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場，如有應該研究的地方，也從事研究，期使呼吸相調和』。

細細地咀嚼有田外相第一次在會議的上述演詞，有一點給我們思索的，就是：日本政府尚要『研究』的，應是什麼？大概不外三點：第一是走私問題；第二是華北增兵後，可擴大情勢的對策；第三是由上舉兩問題而引起全中國民衆憤怒的應付問題。自然，在日本軍部的字典中，『中國民衆憤怒』幾個字，是沒有，但日本的聰明外交家，却有妥爲應付的警戒心，霞關既承認軍部在華北的動作是對的，又要避免對中國人民的刺激，這事本不容易，但當時的中國政府，却有給日本外交家施恫嚇威迫的機會。結果，本來的目的是不激起中國民衆的反作用，而所得的效果，却日本所意料不到之中國政府對於家

中國人民的各種統制。增兵華北後，可擴大的局勢，表面上，好似是屬於華北駐屯軍的任務，但依有古明前大使所述的經驗（註二），牠與震關人員在南京的交涉，却有密切的關聯。結果，採取『現地不擴大主義』，慢慢地迫冀察政府與冀東偽組織合污同流；這一點當日的軍部，似乎也與以同意（因此兩廣異動時，不見華北駐屯軍的『發揮實力』）。而較難解決的是走私，因為牠所牽涉的範圍頗大。

華北走私，自偽國成立後，由於失去大連海關的功用，早已活躍，幸有海關緝私的嚴密，不能有所發展。及冀東偽組織成立，撤去陸地藩籬，以武力爲後盾，走私的猖獗，在於意料之中。開始時候，日本政府的希望，是以之爲取得天津海關管理權及減低關稅的代價，後來由於冀察委員會柔弱無力，使浪人的行爲，以得寸進尺的姿態，愈演愈奇。於是，引起了兩個結果：第一，走私不特破壞了中國關稅制度，而且無形中毒殺了中國的民族工業，這一點決非國民政府所能允許。中國政府雖不能直接取締浪人，而對於本國作奸犯科者的行爲，用法規和人民自動的糾察，在內地却不能說毫無效果。就在日本方面，走私的發展，可影響正當的貿易，使未取得走私利益的日本資本家起而非難。取締浪人，不說非日本外交當局所肯爲，就在駐屯軍關東軍『注意』的情勢下，也無由取締。不能解決這宗事，國民政府固無積極的對付手段，而如何撫慰內地資本家的不滿，這是有田要『研究』的一點。其次，走私的結果，不獨破壞了中國工業，而且使各國在華的利益，受着損害，尤其是與中國關係最爲密切的英國，不能袖手旁觀。也就是說：會影響到整個廣田內閣的對英問題。

六 日本之南進與北進

爲什麼中日的外交，會影響到廣田內閣的對英問題呢？我們知道，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在參謀部中預定的國策，不外兩點：「南進北守」，與「北進南守」。如果採取前者，則對英衝突，對俄和平；如